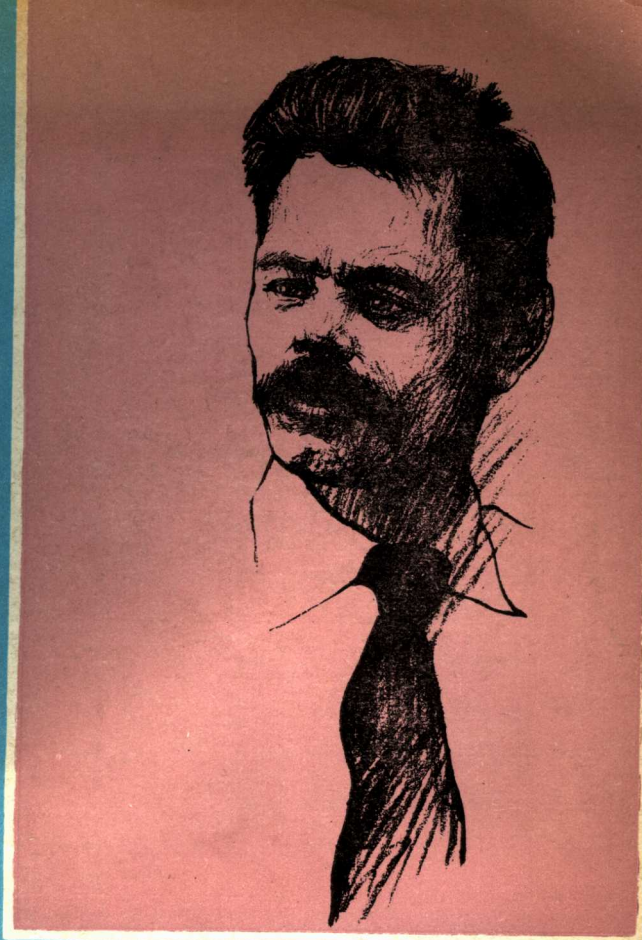


夏天



Kanpu 1907—1908r

Молодой Кан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夏 天

〔苏联〕阿·马·高尔基 著

陆 风 译

А. М. Горький

ЛЕТО

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Том 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0 年出版的
《高尔基全集》30 卷集第 8 卷译出。

夏 天

[苏联]阿·马·高尔基 著

陆 风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轻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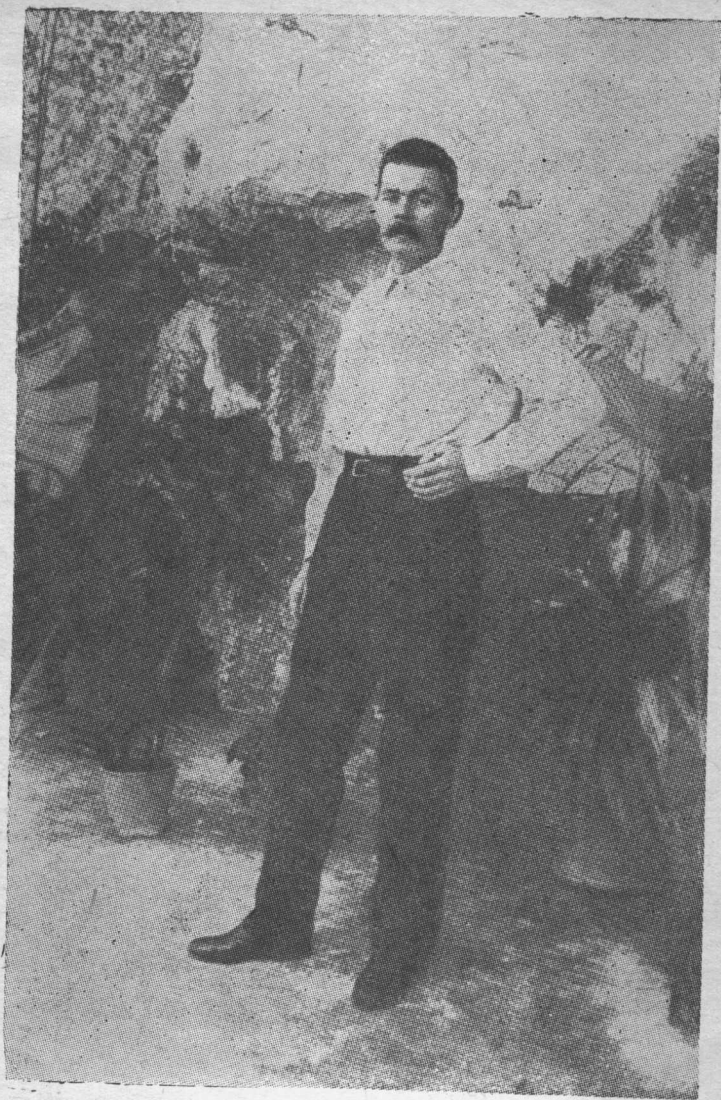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1/4 字数 120,000

1982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1982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63,000 册

书号 10228·017

定价 0.60 元



作者像 (1908年)

S 1915/08

关于高尔基和他的《夏天》

高尔基是我国人民很熟悉、很尊敬的伟大作家和朋友，是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写作的目的，在于歌颂好的东西，使它发扬光大；揭露坏的东西，使人望之生厌，引起一种冲动，从而把它加以消灭。因为作家不是一架照相机，他并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把它加强、改变或毁灭。高尔基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笔，有力地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他的优秀作品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带来了崭新的创作原则和最高的美学理想。他通过个人和人民的统一，通过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热情，揭示出人的精神最高的美质，培育着社会主义的高尚道德情操。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亲密战友，他紧跟着列宁，把自己的创作和俄国及世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自由文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彻底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文学艺术的美学理想。1905年列宁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之后，高尔基于1906—1907年便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列宁高兴地称这部小说是“极合时宜”的书。所谓“极合时宜”，是因为当1905年俄国革命遭受挫败之后，反动的沙皇政府气焰嚣张，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者一批批被流放去做苦工，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俄国知识分子内部的颓废、动摇情绪日益增长，许多人甚至退出了

革命的战斗行列。有不少所谓时髦作家，开始“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讥笑革命，赞美叛变行为。借“崇拜个性”之名，鼓吹放荡淫乱。正如高尔基在《个性的毁灭》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这一时期，社会问题已不能引起作家们的创作兴趣。许多作家从对社会事件天才概括的高度滑落到了对生活琐事的平庸描写。诗人变成了文丐，或巧或拙地借用舶来的思想……用一些显然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谈论日常事物。文学作品越来越单薄，作品内容越来越贫乏，作家的语言也越来越冷淡。真挚的热情熄灭了，革命的激情没有了。文学作品已经不成其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象是丢在街头尘埃中的破镜的碎片，社会意识的水银已经剥落殆尽，无法用它那破碎镜面反映出人类社会的伟大生活，只能反映出街头生活的片断和破碎心灵的残屑。但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则与众不同，他在那黑暗而艰难的日子里，依然顽强地坚持崇高的信念。他最热情、最理智地爱护着人民，在人民遭受不幸的时候，坚持用自己的文学艺术作品，去唤起人民的英勇精神。他首先响应了列宁关于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党的文学的号召，及时地写出了一部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充满着共产主义党性的长篇小说《母亲》。在黑暗中放射出一道光芒，照亮了革命的前景，振奋了工人阶级低沉的情绪，坚定了胜利的信心。高尔基成功的创作经验，也给作家们的创作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后来，斯大林称高尔基的创作方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长篇小说《母亲》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典范，并作为社会主义美学理想在艺术中的表现而获得了世界意义。

在长篇小说《母亲》之后，列宁向高尔基建议再写作类似《母亲》这样的小说。高尔基为执行列宁的指示，便构思了中篇小说《儿子》，打算继续反映《母亲》里的巴威尔·符拉索夫后期的革命

生活。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高尔基把《儿子》的这一构思，写成了中篇小说《夏天》和两个短篇小说《幻想家》、《莫尔德娃女子》。

中篇小说《夏天》于1909年写成，和1907年《母亲》的出版相距两年，这两部小说，无论从时间上看、从内容上看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母亲》所写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在索尔莫伏区发生的工人群众英勇壮烈的革命斗争事件。《夏天》所写的则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偏僻山乡的高家村里，继续搞秘密革命活动时所发生的庄严而有趣的故事。两部小说，无论在反映时代生活的高度和深度方面，在以典型人物、典型情节烘托作品主题思想的新颖卓越的创作方法方面，以及在用积极肯定生活、热情向往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鼓舞人们去追求伟大壮丽生活目标的艺术魅力方面，都值得我们欣赏、研究和借鉴。

如果说高尔基的《母亲》是一部鼓舞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诗篇，是一部鼓舞人的新生和“复活”的诗篇，那么，用这话来评价高尔基的《夏天》，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因为高尔基一向主张要写新的英雄事物，他早在1900年一月五日就给契诃夫写信说：“……大家都希望有一种鼓舞人的、光明灿烂的东西。你知道，不是同生活一样，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现代的文学必须多多少少地开始美化生活*，只要文学一开始这样做了，生活就一定会美化起来。也就是说，人们会开始活得更轻快、更开朗了。可是现在——你看一看，他们的目光有多么糟糕，厌倦、浑浊、冷酷……”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篇小说《夏天》的写作背景和它的艺术特点，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俄国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吧。试浏览一下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作家们所写农村生活的文艺作品，几乎全是用非常阴暗的色调来描写农民的贫困、文化落后和

由于最残酷的剥削所造成的生活痛苦。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后，由于反动政府的农村政策是扶植富农，准备发展富农经济，这便使贫农的生活变得更加恶劣。所以在这一时期所有描写农村的文艺作品也更加悲观消极和阴暗无光。只有高尔基的小说《夏天》象黑暗中的一颗明珠，闪烁出喜人的亮光。它以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历史真实地、具体地表现了革命低潮时期俄国农村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高尔基在表现农村的时候，不仅仅是生动地描写出农村的现实生活，而且通过典型的人物性格和典型的生活细节，鲜明地预示出了农民生活必然发展的美好前途。他象在长篇小说《母亲》里写工厂工人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加明显的那些特点一样，他在中篇小说《夏天》里，写农村的农民生活，也是放在远景上来描写的。他在刻画《夏天》里的叶戈尔和瓦丽娅等主要人物时，也象刻画《母亲》里的巴威尔和尼洛夫娜等主要人物一样，是满怀对未来胜利的憧憬，把他们内心的觉醒、斗争的朝气和革命乐观精神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而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的。

有人提出为什么小说《夏天》描写革命低潮时期的农村生活，仍然全篇始终洋溢着愉快、幽默而又逸趣横生呢？这不仅仅在于作者一开头就借小说主人公、革命青年叶戈尔·特拉菲莫夫之口，非常热情、乐观地向读者表明：他立志要选用象眼前那斑斓多彩的秋叶一样鲜艳喜人的语言，既自然又美妙地述说出他亲身所经历过的夏天的故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写的故事本身那些饶有趣味的情节，具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他们那新颖、别致、耐人寻味的幽默谈吐上。作者并没有象某些个别作家那样，用幻想和虚构，凭空给故事添加廉价的噱头和光明的尾巴，以博得读者暂时的欢欣，而是用真实的、具体的现实生活本身来

体现出农民们深刻的革命乐观思想情绪，使读者从中受到强烈而巨大的艺术感染。

不可否认，高尔基确实是非常重视文学语言的。他曾把一个民间谜语称为最聪明的创造，这个谜语形象地道破了语言的意义：“不是蜜，但是它可以粘住一切。”在高尔基看来，这种能够紧紧粘住了对象，紧紧吸住了读者的，就是他所理想的、富有魅力的艺术语言。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尔基曾向青年作家们强调要在语言修辞上下功夫，因为这是文学描写的首要问题。他认为文学家用艺术作品描写现实人物性格时，就是把现实变成语言。创作出来的作品应能通过语言大大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这样，语言又变成现实。高尔基特别重视语言的自然美和表现力。他认为文学形象，只有当它是由语言刻画成为有血有肉，可以触摸得到的时候，才能够使人真正信服和深深感动而产生艺术效果。小说《夏天》里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语言，这样生动、美丽、新颖、幽默、深刻的艺术语言风格，当然这也是能使小说情趣横生、引人入胜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作为文学艺术家的高尔基，当他修饰和琢磨语言时，所追求的并不仅是语言表面的生动、确切，而更加重视形象的艺术真实。因为高尔基的艺术技巧，出色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里。小说《夏天》的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尔基的每个形象，笔触深浓，各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对人民、对祖国、对艺术、对宗教、对哲学、对历史、对自然、对生活以及对政治斗争中的许多问题，各有各的态度和看法。小说里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各种不同的面貌，活灵活现在眼前，令人永记不忘。

罗曼·罗兰曾惊叹地把高尔基的艺术慧眼称为“出奇明亮的

目光”，他说高尔基甚至对一个偶然的、顺便过目的形象，也能非常具体地、十分确切地素描出来。他经常注意对形象的分析研究，善于用富有表情的、对形象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动作姿势来描写形象的性格。高尔基笔下的人物语言、对话，也起着描写性格的作用。高尔基经常劝青年们要特别注意写人物性格。

巴甫连珂在回忆高尔基的日常谈话时写道：

“他常说，现在该是写关于俄国和苏维埃人物性格的‘科学’（引号是笔者加的）著作了……他打量了一下在他那儿作客的文艺工作者们，又补充道：‘我要是更年轻些，一定要写出成打成打的人物形象，三十个、或五十个。写那些优秀的人。年轻人！我会超过你们大家的。你们可要赶上啊！’”

高尔基一生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其完整性、精确性和多样性而论，的确可以称为社会历史人物性格的“科学研究”（引号是笔者加的）。

小说《夏天》里的反面人物性格，总是毫无自信，感到自己不断削弱和最后必然走向灭亡的情绪，对于未来惊慌失措、消极悲观。与此相反，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农民革命运动的正面人物，则富有朝气，聪明机智，充满了力量和自信。因而，当故事中写到革命力量暂遭失败时，而读者并无丧失前景的感觉，反而恰似预示着革命胜利更加迫近了。革命故事的真正结局仿佛即将发生在作品范围之外。例如高尔基的剧本《仇敌》和小说《夏天》的结局都是起着这样的效果。剧本《仇敌》以革命工人们的被捕而告终。但当工人们被带走时，却听到了塔吉雅娜预言性的喊声：“这些人一定能胜利！”小说《夏天》的结尾，有被捕而押解归案的革命农民，在风雪途中还想要大声高呼：“我亲爱的农民啊，复活节就快来到了！”我们读到这里，必将明显地理解这句话的至深含意。

这绝不是那几个革命的囚犯忘记了自己风雪途中受不尽的苦难折磨，而无欢强笑地突然向全体农友们发出一句复活节日例行惯用的祝贺话。这正是小说作者用深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的最强音，通过革命农民之口喊出了当时的俄国劳动人民必然会冲破重重黑暗，最后取得彻底解放的伟大历史真理。

只有象小说作者高尔基这样，已经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农民的思想感情能够体察入微，对农民解放的命运怀着科学的理解和高度的同情，才有可能用典型形象和卓越的艺术概括手法来揭示出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和必然胜利的规律——这就是小说所以能够充满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使小说全篇洋溢着愉快气氛而产生积极的艺术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尔基的人物形象、艺术概括的特点，不仅仅在于社会内容的广泛与丰富，而且在于他那高瞻远瞩的历史预见。作者把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形象，都作为指示未来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加以仔细考察研究，以便通过这些形象，全面地(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反映出历史的真实。

高尔基坚决反对当时那些资产阶级作家们既短视又色盲，他们只看到农民一时的落后方面，而在作品里大大歪曲了真正劳动农民的光辉形象。高尔基一直到生前最后一次讲话中还在批评个别作家的“视力短浅”，他说：“作家的眼睛看不到现实。”要知道，我们不仅要认识过去和现在两方面的现实，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三种现实。那就是属于未来的现实……我所说的关于第三种现实，并不是一句俏皮话，完全不是的。我觉得它是这个时代的、有决定意义的号角，是革命的命令。我们应当马上把这第三种现实变

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应当描写它。没有它，我们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当然，高尔基在这里绝不是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由过去、现在，再加上对未来的空想所组成的。他主要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有可能、也有责任用他所描写的每一个事物向人民揭露他终生与之斗争的那种衰朽的过去，并且展示他全力积极争取的新生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他对党所应尽的义务，才能够使他的创作有助于以社会主义美学理想来教育人民，有助于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基于这种观点，高尔基主张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应该是这样创造出来：即在今天和明天的统一中来描写，在其发展过程中考察它的特点。人物要描写成不仅仅是象他今天的样子，而且还要描写出他的明天应该、必定会变成的样子。他必须有、而且一定有明天。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夏天》里，对农民形象突出地做了一些美好的描写，对先进农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夸张。实际上，在俄国斯托雷平黑暗反动年代和沙皇统治面临着崩溃，而伟大十月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这样描写俄国农村里的农民革命力量，并非过分，恰是完全符合于历史的真实的。

高尔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深刻的现实主义，是“变革和改造世界人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形象思维，应以对生活的新理解和关于人的新概念为前提。这种对文学艺术原则性的更新精神，也具体表现在小说《夏天》主人公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整个故事情节的描写里面。

小说《夏天》的主人公是一个化名为叶戈尔·特拉菲莫夫的新型革命青年，他聪明而勇敢，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在1905年俄

国革命失败后，怀着满腔革命热情，秘密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搞地下活动。他不仅能够努力团结、引导青年农友，而且谦虚地向农友们学习。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大家紧密地团结成了一个革命集体。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伟大的、同志式的真正革命友谊，互敬互助，没有私心，没有嫉妒，甚至当两个叶戈尔在工作中各自都爱上了女青年瓦丽娅时，面对着这种意外的、尴尬的三角关系，两位革命青年同志也居然都能够自觉地以革命为重，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很顺利地得到了正确而合理的解决，并没有给他俩的真挚的革命友谊留下丝毫芥蒂和暗影。当主人公特拉菲莫夫一旦发现他所领导的青年农友们在斗争中飞快提高，已经超过他自己，并不客气地对他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时，他也丝毫不因此而忧虑个人威信会降低，他内心反而感到更加高兴起来。他说：“他们多么迅速地超过我而成长起来了啊！我感到我所要做的事，已经完成了。我所能给出的东西，都已经给了。他们正走向他们所需要去的地方，即使我赶不上他们的步伐，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不愉快的。”

小说还创造了一个正直、坚强，带着明朗微笑和愉快声音的、可爱的农村青年妇女瓦丽娅的崭新形象。瓦丽娅在许多方面跟小说《母亲》里的母亲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的精神面貌很相似，瓦丽娅热情诚挚，努力学习革命的道理，相信革命最后必获胜利。小说虽然也描写了农村生活中的阴暗现象和极丑恶的事物，甚至当小酒馆里发生了放荡女人达尼娅被乡警杀害和乡警绝望而自尽的悲惨事件时，也并未破坏了笼罩小说的那种明朗乐观的气氛。在两具半裸男女的血腥尸体跟前，青年农民叶戈尔·德赛金却依然继续幽默而风趣地对大家说：“就拿眼前来看吧，这两个人原来多么强壮、健康？他们的身体多么结实——难道这不可惜吗？要是能

给这些肉体注入新的灵魂，他们将会给人生做出多少好事来呀！”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高尔基，在真实地描写俄国农民生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赞颂我们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热心生产劳动的优良传统。作者通过一个被沙皇政府押送到侵华前线打仗回来的退伍兵米哈依洛·格涅陀依在一次农友会上，眯缝着眼睛，皱起眉头发言说：“……噢呀，我的天啊！原来我又是被骗啦。你们这些笨驴！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咱们的仇敌呢？……”“难道说他们跟我全是自己愿意去互相残杀的吗？我的好弟兄们！说真的，大家都是一个心愿：就是要为自己的后代子孙好好劳动。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说一样不一样呢？一样的！比如我问那个中国人：‘老乡，你是干什么的呀？’那中国人这样回答：‘就是干这个，种地嘛！’那是个对咱挺温和、挺尊敬、又挺健壮的中国人，他丝毫不愿意打仗，就愿意和和平平地过日子，什么是非也不沾惹。可是，咱们的军队却到那儿去毁坏他的田园、烧他的房子、砍伐他的树林、打伤他的身体。哎唷！我的天啊！真可怜，真叫人痛心流泪呀！要是那个中国人愿意打仗，他一定会给俺们一顿好打的！他虽是个健壮汉子，但心挺慈悲善良。看见他眼前这情景，他想着：‘这些混账王八蛋！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他有屁股大的一小块田地，从那块田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好象从母牛身上流出来的奶汁一样丰美。要是咱们好好儿地请教请教这个中国人，他会教给咱们干许多好事！他是他那块田地的亲人，他深知田地需要什么。他真象收拾他的床铺一样仔细地收拾田地，嘿呀呀！”小说《夏天》中这段生动的发言，也真实地揭出了历史上造成日、俄在中国境内战争的原因，绝不是两国的劳动人民和普通士兵，而是中、俄两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反动的俄、日两帝国政府侵

略扩张政策造成的。只有彻底消灭了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中、俄两国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共同的愿望：享受和平生产、自由劳动的美好幸福生活。

小说作者高尔基经常号召文艺作家要全面地研究现实，并热情地说服文艺作家们为祖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参加共同的斗争。他曾经说：我们文学家的任务，不仅要批判地描写今天的旧残余，而主要是帮助巩固今天革命的成果，阐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在高尔基看来，社会主义文学的主要对象是劳动人民，他们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所鼓舞，他们为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力量所武装，这样的人民在世界文学中还从未出现过，全面深刻地描写这样的人民，是极其光荣的任务，但也是异常困难的任务。为此，作家需要观察人们在陈腐腐朽中怎样呼吸，观察未来的火焰怎样在燃烧。青年作家们更要描写新生活中的乐观主义、描写国内种种创造力量的滋生和发展。高尔基坚决反对在作品中脱离现实和“粉饰”生活，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有浪漫主义精神，但仍不减其现实主义的逼真力量，因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本身充满着英勇劳动的激情，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浪漫精神，现实中的英雄主义不仅要求把我们这里的现实浪漫主义化，而且也要求把欧洲和中国的现实浪漫主义化，在中国和欧洲革命的无产阶级正在创造崭新的现实，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我们时代的英雄主义和祖国发展的宏伟前景。社会主义作家只有站在明天的高度观看今天，并从今天看到建设未来的英雄主义的时候，才能够正确地描写今天。中篇小说《夏天》在一定程度上也突出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文艺创作思想的这一鲜明的特点。

这本小说《夏天》是根据莫斯科苏联文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高尔基全集》原文翻译出来的，经过了“十年动乱”，残稿幸未完全散失。粉碎了“四人帮”后，全国文艺大解放。在党中央领导我国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胜利声中，这部译稿也于1978年10月重新整理校订，1981年付印，到此，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因译者水平有限，疏漏错误，必定难免，希望读者指出，以便再版时更正。

译 者

-
- 高尔基在这里所说美化生活的意思，并不是脱离生活的真实，而是把正面的健康的因素，其中包括那些还在萌芽状态中的因素，提到首要地位。——笔者注。

……我往窗外一看——山脚下，大片盛装的树林在猛烈地摇动，狂风揉搓、撕扯着鲜艳耀眼的红枫和白杨的树梢，从枝头扯掉那金黄色、灰白色、殷红色的树叶。树叶旋转飞舞着落到蓝湛湛的河水里，在水面上绘出神话般五光十色的、已经逝去了的夏天的图景。于是，我也很想用那同这秋叶一样富有色彩的语言，把我在这儿亲身经历过的夏天的故事也如此这般又自然又美妙地讲述出来。

我是由一个熟人介绍到这个僻静的森林地带，杜曼诺夫斯基县的高家村来的。那时我装扮成了一个下乡避暑的人。身份证上的姓名是三等商人叶戈尔·彼特罗维奇·特拉菲莫夫。履历是这样写着：原籍莫斯科，经营食品杂货店；革命^①后，因害怕没收财产，吓成了精神病，已经医院治疗一年余，现拟觅一幽静处所安心休养；已丧偶，别无亲眷；患有神经错乱症。这份身世帮助我很快就跟村里的农民接近起来了。就这么一个破产而潦倒的、外加半疯半痴的人，可有哪点竟然能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呢？

我在一个孤身贫苦的老处女家里租到了一间小屋，言明租金九卢布，可以一直住到圣母节^②。我一连几天，在村里到处走动，好让大家看到我，也结识一下住在本村的那位乡警，邀请他喝茶，求他保护并多加关照。这些事进行得都挺顺利，乡警摆出了保护者的架式，对我点头赞同说：

① 指一九〇五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译者注。

② 俄国正教以每年旧俄历十月初一（公历十月十四日）为圣母节。——译者注。